

唐诗研究系列

刘学锴 / 著

李商隐诗歌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唐诗研究系列

李商隐诗歌研究

刘学锴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合肥



唐诗研究系列
李商隐诗歌研究
刘学锴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6 千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册
责任编辑 杨应芹 封面设计 孟献辉
责任校对 张红一

ISBN 7-81052-109-8/I·10 定价 14.50 元
(如有白页、缺页、倒装等,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次

引 言	(1)
本体篇	(3)
一、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3)
(一)李商隐以前咏史诗的发展	(4)
(二)李商隐咏史诗的讽时性	(6)
(三)李商隐咏史诗的典型性	(10)
(四)李商隐咏史诗的抒情性	(14)
二、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发展	(18)
(一)李商隐以前咏物诗的发展	(18)
(二)从类型化向个性化的转变	(21)
(三)李商隐托物寓怀诗的艺术特征	(26)
三、李商隐的无题诗	(32)
(一)无题诗界说	(32)
(二)李商隐无题诗寄托问题辨析	(35)
(三)李商隐无题诗的特征	(43)
四、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	(50)
(一)李商隐以前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	(51)
(二)李商隐诗中的命运感慨与世情感慨	(55)
(三)李商隐诗中的情绪型感慨	(59)
五、玉谿诗对樊南文的渗透与影响——论樊南文的诗情诗境	(65)
(一)樊南文中的诗语	(66)
(二)樊南文中的诗情	(69)
(三)樊南文中的诗境	(74)

(四)樊南文的诗心·····	(77)
源流篇 ·····	(80)
六、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	
传统·····	(80)
(一)李商隐与宋玉身世境遇、思想性格的相似点·····	(81)
(二)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主题和悲秋伤春的	
意蕴·····	(83)
(三)微辞托讽·····	(85)
(四)抒写艳情绮思·····	(87)
(五)李商隐与宋玉的异同·····	(88)
(六)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	(90)
七、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	(93)
(一)中晚唐绮艳诗风与诗的词化·····	(94)
(二)李商隐诗的词化特征·····	(98)
(三)李商隐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	(103)
研究史篇 ·····	(112)
八、历代李商隐研究述略·····	(112)
(一)从唐末到明末的李商隐研究概述·····	(113)
(二)清代的李商隐研究·····	(115)
九、本世纪中国大陆李商隐研究述略·····	(129)
(一)传统笺注考证成果的总结·····	(129)
(二)在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李商隐研究的	
新变化·····	(134)
(三)总结与创新并重的建国后李商隐研究·····	(139)
十、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述略·····	(149)
(一)无题诗的范围、性质、内容与对它的评价·····	(149)
(二)无题诗的艺术特色与成就·····	(158)

考辨篇	(164)
十一、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	(164)
(一)占数东甸	(164)
(二)学仙玉阳	(167)
(三)入泾幕与成婚	(168)
(四)徐幕奉使	(170)
(五)王氏逝世时间	(171)
十二、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	(174)
十三、《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补证	(187)
(一)刘蕡自柳州司户内迁澧州司户及其时间	(187)
(二)刘蕡与商隐黄陵别后所往之地与逝世之地	(189)
十四、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	(193)
(一)《李商隐诗集》三卷本系统	(195)
(二)《李义山集》三卷本系统	(197)
(三)季沧苇抄本、朱鹤龄注本及全唐诗的三卷本系统	(199)
(四)明代分体刊本系统	(200)
余论篇	(204)
十五、分歧与融通	(204)
(一)创作起始阶段的触绪多端百感交集	(204)
(二)创作过程中于特定题材的歌咏中融入多方面生活感受	(207)
(三)创作完成后接受主体对同一作品的多方面感受与认识	(211)
十六、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李商隐现象	(215)
(一)钟摆现象	(215)
(二)纷歧现象	(219)
(三)索隐现象	(221)

引 言

唐诗在经历了盛唐和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两个发展高潮之后，正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势。笔补造化的李贺频频觅诗于荒郊古墓，苦吟成癖的贾岛常常流连于幽寺古刹，便显示出原先恢宏阔大的诗国天地已开始露出局狭的光景。而崛起于晚唐前期诗坛的李商隐，却以他极富独创性的诗歌为唐诗展拓出新境界。清初著名诗论家吴乔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唯李、杜、昌黎、义山。”（《西崑发微序》）李、杜所辟，是前所未有的恢宏的盛唐气象、广阔的时代生活和人民疾苦；韩愈所辟，是以非诗为诗、不美为美的新境；而李商隐所辟，则是人的心灵世界这一还未被前人深入表现过的领域。他的诗所特有的感伤情调、朦胧意境、象征暗示色彩，都和表现内心深隐幽微情绪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李商隐继承杜甫感时忧国的精神，学习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创作了一系列内容深广的政治诗，像《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淮阳路》以及赠、哭刘蕡诸作，都是学杜而深得其神髓的佳作。内容涉及方镇跋扈、宦官乱政等政治焦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更是从整体上反映唐代开国二百年来兴衰治乱及其原因的史诗性巨构，在晚唐诗人中可谓无出其右。王安石甚至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蔡宽夫诗话》）。但李商隐最富于艺术独创性的作品，则是他的大量以古鉴今、借古喻今、借题托讽的咏史诗，托物寓怀诗和无题诗。而在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中，又或隐或

显地贯串着共同的抒情内容,即诗人的时世身世之感和人生体验、人生感慨。

李商隐又是大骈文家。他的哀祭诔奠之文和一部分抒情书启具有诗情诗境,体现了“以诗为骈文”的特点,是骈文中的艺术珍品。

本书的“本体篇”将对李商隐的咏史诗、咏物诗、无题诗分别进行研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和论述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抒写人生感慨。并对李商隐骈文的诗情诗境进行阐论。以上各章,力求结合历史的发展揭示李商隐在上述领域所作出的开拓、突破与创辟。

“源流篇”阐论李商隐所受于宋玉的影响以及李商隐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感伤主义传统中的突出地位,揭示并论述李诗对唐宋婉约词的深远影响。前者侧重溯源,后者侧重沿流。二者都从研究者一向比较忽略的方面来阐明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研究史篇”对历代及本世纪中国大陆的李商隐研究作了简要的评述,并对无题诗研究的历史作了专题评述。

“考辨篇”对李商隐生平、游踪、诗集版本系统等分别作了考证、辨正。其中关于江乡之游的考辨,涉及李商隐游踪中一大疑案的证伪。

“余论篇”是在研究李商隐的过程中引发的对研究方法和某些现象的思考。

本体篇

一、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 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咏史诗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朱鹤龄阐发释道源对商隐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五《李义山诗集序》引道源语）的评价，这样写道：

且吾观其活狱弘农，则忤廉察；题诗九日，则忤政府；于刘蕡之斥，则抱痛巫咸；于乙卯之变，则衔冤晋石；太和东讨，怀积骸成莽之悲；党项兴师，有穷兵祸胎之戒。以至《汉宫》、《瑶池》、《华清》、《马嵬》诸作，无非讽方士为不经，警色荒之覆国。此其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断不得以放利偷合、诡薄无行嗤摘之也。

——《李义山诗集笺注》卷首朱鹤龄《序》

朱氏用来论证其观点，驳斥传统偏见的诗例，咏史诗竟占半数，可见它对评价商隐诗品与人品的重要性。本章不准备对李商隐咏史诗思想与艺术的诸方面作具体论列，只着重从总体上揭示其主要特征，说明它对古代咏史诗有哪些重要发展。而要说明这一点，先要对李商隐之前的咏史诗作一简要回顾。

(一)李商隐以前咏史诗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诗的国度。人们在缅怀历史、追慕前贤、评论前代的成败得失,褒贬前人的善恶美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都会很自然地运用诗歌加以表现,咏史诗因而在古代诗歌史上有悠长传统。《诗·大雅》中关于周部族的系列史诗《生民》、《公刘》、《绵》等篇,不妨视为赞颂先民业绩的咏史诗,而《荡》诗假托周文王指斥殷纣,以寓讽周厉王之无道,则开托古讽今一类咏史诗之先声。荀况《成相篇》引述古帝王贤愚明暗之事为鉴,不妨视为以古鉴今一类咏史诗之滥觞。正式以“咏史”命题,始于班固赞颂缙紫教父的五言诗。此后,历魏晋南北朝,咏史诗代有制作,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类以歌咏历史人物的品行事迹为主,其中又有偏于抒情议论的与偏于叙述的两种。前者如王粲、阮瑀咏三良殉死的《咏史诗》及颜延之的《五君咏》,后者如左延年、傅玄的《秦女休行》和陶渊明的《咏荆轲》。一类以歌咏历史事件为主,如阮籍《咏怀·驾言发魏都》、卢湛《览古诗》(叙蔺相如完璧归赵事)、虞羲《咏霍将军北伐》等。一类系借咏史以抒怀,左思《咏史八首》是其代表。以上三类,也不妨简括为咏人、咏事、咏怀。这种划分自然是相对的,各类之间常有交叉乃至交融。

从先秦到南北朝,咏史一体经长期发展虽已确立(萧统编《文选》列“咏史”诗一类,即反映这一事实),但作品数量很少,题材较窄(咏三良、二疏、荆轲、秦女休、秋胡等人的占很大比重),像陶渊明的《咏荆轲》这种艺术上高水平之作更属凤毛麟角,无论量与质都不能跟其它主要题材的诗作相提并论。

入唐以后,制作渐多,佳篇间出。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是初、盛、中唐时期写作咏史诗较多的诗人。子昂《感遇》、太白《古风》,均多借史寓讽现实之作。而陈

作每有对宇宙人生历史的哲理思索,李诗则常借赞颂古人以寄托人格理想,体制虽同,个性有别。王维咏史诸诗,多为前期所作,《夷门歌》颂侯嬴、朱亥之侠义,诗人的慷慨意气溢于言表。杜甫《蜀相》、《八阵图》等咏史名篇,则将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悲慨与忧时、自慨融为一体,沉郁悲凉,为咏史一体别开生面。刘、柳咏史,每多隐射现实之意,吕温则好作翻案之语。白居易咏史,好发议论,常陷理障。总的看来,纵向比较,成就自高于唐以前;横向比较,成就显然不能与其它热门题材(如边塞、山水田园)、传统题材(行旅、送别)、重要题材(政治、社会)相比,甚至不能与咏物、怀古相比。在初、盛、中唐诗坛上,咏史诗所占的地位并不突出。有的研究者认为咏史诗在中唐已呈繁荣,并把刘禹锡作为工于此体的杰出代表,这恐怕是没有注意到咏史与怀古的区别,把怀古诗也划入咏史诗范畴的缘故。尽管它们都以“古”为吟咏对象,在发展过程中时有交叉,甚至有题为“怀古”实系咏史的情形,如陈子昂《蓟丘览古七首》、李德裕《东郡怀古二首》、李涉《怀古》(尼父未适鲁)、贾岛《易水怀古》、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汴河怀古二首》等均其例,但毕竟是两类诗。一般地说,怀古诗多因景生情,抚迹寄慨,所抒者多为今昔盛衰、人事沧桑之慨;而咏史诗多因事兴感,抚事寄慨,所寓者多为对历史人事的见解态度或历史鉴戒。如李益的《汴河曲》与李商隐的《隋宫》七绝,都咏隋亡与隋堤,而一咏春色常在而隋宫成尘以抒今昔盛衰之感慨,一写南游之靡费以寓奢淫覆国之教训,着眼点显然有别。刘禹锡《金陵五题》、《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诸诗中“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正是典型的怀古诗音调。以歌咏历史人事为内容的咏史诗,其繁荣期是在晚唐。小李、杜和温庭筠都是咏史名家,李商隐的咏史诗更达到这一体的艺术高峰,而且是后人从总体上未能逾越的高度。

从班固正式创体到中唐,咏史诗的创作尽管代不乏人,而且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但并未在某一时期形成创作风尚,艺术上也没有全面的突破性进展。这是因为,咏史诗的繁荣,既需要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心理背景,又需要杰出的诗人在大量创作咏史诗的艺术实践中比较妥善地处理和解决咏史诗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诸如歌咏史事与面对现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议论讽刺与情韵意境等关系。晚唐时代统治者的荒淫腐败和深重的政治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统治者极端失望的情绪与强烈的危机感,促使诗人们观古知今,在历史与现实对照中触发诗思与感慨,引出鉴戒与教训,一种感慨衰世末世的咏史诗遂应运而生。李商隐适逢其会,以其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高超的诗艺大力创作咏史诗,在实践中较好地解决了上述关键问题,遂有力地推进了咏史诗的发展。

(二)李商隐咏史诗的讽时性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六十余首,无论数量或比重均超过同时代以咏史诗著称的杜牧。小李、杜的咏史诗艺术上各有千秋,但论总体成就,李商隐的咏史诗显然高于杜牧。

李商隐咏史诗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强烈的讽时性。咏史诗所歌咏的历史人事,并不一定都与政治有关;即使有关,诗人也完全可以泛泛咏古,不涉时政。但商隐的咏史诗却绝大部分都是借咏史以讽时的政治诗。前引朱鹤龄的一段话就明白揭示出《隋师东》、《汉宫》、《瑶池》、《华清宫》、《马嵬》等均属寓讽时政之作。他的六十来首咏史诗,按其与现实政治联系的方式来划分,约有三类:

一类是以古鉴今之作。重在借历史上荒淫奢侈而招致祸乱败亡之君昭示历史教训,寓含对当代封建统治者的警戒感慨,像《齐

宫词》、《隋宫》二首、《马嵬二首》等均为显例。

一类是借古喻今之作。诗面虽咏古人古事，实则借喻具体的今人今事。《陈后宫》二首、《北齐二首》，表面上讽陈后主、北齐后主，实为寓讽唐敬宗、唐武宗。《瑶池》、《汉宫词》、《汉宫》、《茂陵》等，虽咏周穆、汉武，实亦对武宗之好神仙、宠女色有所讽慨。这一类与上一类的区别，在于一为间接的鉴戒，一为直接的借喻；前者并不针对具体人事，后者则意有专属。

一类是借题托讽之作。第二类诗面所咏确系古人古事，这一类则仅在题目中假托古人古事，实际所咏与古人毫不相干，完全是今人今事。如《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看题目像是要讽刺号称“无愁天子”的北齐后主高纬，但诗的内容与高纬生平行事及北齐时事全然无涉，仅借“北齐歌”这个题目作掩饰，用很隐晦的笔法暗讽当代的“无愁天子”唐敬宗之被杀（见拙著《李商隐诗歌集解》第一册20-21页关于此诗的笺语）。《隋师东》题面是隋师东征高丽，实际写的是唐廷东征李同捷的战争。有的注家不明此类诗借题托讽的特点，用北齐、隋朝史事去注解，结果越注越糊涂。如果说借古喻今之作还给今人以全副古人装扮，那么借题托讽之作便只给今人戴上一顶古人的帽子。

以上三类，或鉴戒，或借喻，或托讽，方式不同，指向均在于“今”。因此可以认为都是政治诗，或者说是在晚唐特定时代条件下以咏史形式出现的政治讽刺诗。值得注意的是，就内容与表现形式的鲜明性来看，一、二、三类，依次递减，第三类最为隐晦；但就它们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看，则第三类最直接，第二类次之，第一类最间接。这说明，越是跟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假托影射之作，就愈趋隐晦，正如沈德潜所说：“义山近体，鬢绩重重，长于讽喻。中多借题揶揄，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说诗啐语》卷上）不过，从艺术上看，最成功的往往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中所咏人事本身具有一

定典型性者。因为以古鉴今之作与现实政治的联系着眼于以史为鉴。这种鉴戒意义是从历史现象的相似重复中感悟抽绎出来的,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规律性,因而它的现实指向相当宽泛。诗人在构思时有较大自由,不必为了搞古与今之间的人事对应比附而使诗思受到拘牵,读者在阅读鉴赏时也可以有较大联想空间。作者不求跟现实中某人某事对号,读者反而可以跟过去当前一系列类似的人事对号。历史鉴戒所包含的规律性是跟诗歌内容的典型性、普遍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以古鉴今之作所咏之古既是真正的古人古事,它的表层内容便与现实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诗人在创作时便不致单纯从功利着眼,只注意政治目的,而能较多地从审美角度去感受、审视对象,力图艺术地再现历史人事的场景或片段,因而它的审美价值也往往比较高。不仅以古鉴今之作是这样,实际上借古喻今之作中审美价值较高的也主要是凭借它所描写的古人古事本身的典型性与生动性。以《北齐二首》为例,它虽可能有某种现实针对性,但它的主要价值却在于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北齐后主和冯小怜这一对末代帝妃不顾一切的荒淫享乐的行为、性格与心态。一个对唐代历史缺乏具体知识的读者可能根本想不到诗中的高纬与冯小怜跟喜畋猎、宠女色的唐武宗与“袍而骑”的王才人有什么联系,但却可从高纬与冯小怜联想起许多淫昏之极的“无愁天子”与宠妃。相比之下,那首句句影射唐敬宗被杀的《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反倒缺乏典型性而难以引发联想了。

但不论显明隐晦、直接或间接、成功与否,李商隐的咏史诗大都具有强烈的讽慨现实政治的色彩,则是很明显的。这一突出特征使他的咏史诗具有鲜明的现实感、时代感。咏史诗所歌咏的是已经逝去的历史人事,如果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没有注入当代人对历史人事的感受与认识,没有渗透诗人对自己所处时代政治风云、社会生活或自身遭际的感受,历史人事便是冰凉的躯壳,引不起人们

对它的兴趣。因此如何使咏史诗具有现实感、时代感,乃是咏史诗艺术生命与魅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咏史诗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李商隐之前,诗人们在这方面已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像左思借咏史以抒己怀,便反映出当时寒门庶族与门阀世族的对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但这种咏怀之变体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咏史之变体;它可以成为咏史之一体,却不能成为咏史的主体。此外,借咏史以讽时,亦由来已久,但在李商隐之前,还比较零星,形不成一种自觉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在咏史诗的创作中,历来就存在单纯咏古的倾向,题材的蹈袭,命意的相因屡见不鲜。如果让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咏史诗势必失去鲜活的时代气息而逐渐停滞、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商隐大量创作具有强烈讽时色彩的咏史诗,确实标志着加强咏史诗现实性与时代感的一种自觉努力。特别是他把讽刺的矛头集中指向当代荒淫昏愤的封建统治者,更触及时代政治的焦点和热点,其成功实践为咏史诗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像贾谊、商山四皓这类题材,咏史诗中屡见歌咏,如泛泛咏古,便毫无新意。李商隐的《贾生》却借歌咏宣室夜召、前席问鬼之事翻出新意,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代统治者;《四皓庙》(本为留侯慕赤松)则借对“萧何功第一”的异议,表达了对武宗、李德裕君臣未能定储的遗憾。陈旧的题材由于注入了现实政治内涵而获得了新鲜感与时代气息。对比之下,胡曾《咏史诗》中的《四皓庙》便显得非常浮泛,可以不作了。

咏史诗一向以正面赞颂、评论和抒发感慨为主,很少与讽刺结缘;即使咏荒淫之主,也常出之以严肃的指摘批判。商隐咏史诗除极少数带有自况意味之作(如《宋玉》、《王昭君》)以外,大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对于他笔下的荒淫昏顽之君,诗人的基本感情倾向是辛辣尖刻而冷峻的讽刺和揶揄挖苦,不是充满感情的劝诫讽喻或惋惜遗憾。像“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休夸此地

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这类尖刻的讥嘲固不必说,就是“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玉玺无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类极圆转流美的诗句,也同样渗透了对荒淫亡国之君的揶揄鄙视之情,反映出身处末世怀着深重危机感的诗人特有的感情倾向。这同样构成了李商隐咏史诗鲜明的时代风貌和艺术个性。

(三)李商隐咏史诗的典型性

李商隐咏史诗另一重要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

咏史诗所歌咏的题材,多为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与事件,史实为读者熟知,自不能离开基本史实任意增添虚构,否则就会失去咏史诗的基本品格。但如全按史实的原样写作,又势必成为韵语的历史实录,达不到更高、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具普遍性的境界。咏史诗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必须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围绕这个关键问题,李商隐作了多方面的成功尝试。他不是简单地“隐括本传”,撮述史事,而是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进行提炼加工(包括一定程度的想象虚构),使诗中的人物、事件、场景既不脱离历史的基本面貌,又不拘限于历史事实,熔铸成具有典型性的诗歌境界。下面择要举例阐说。

一是用假想推设之辞突破史实拘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与灵魂。《隋宫》七律颌、尾两联分别用“不缘……应是”,“若逢……岂宜”这种推设之辞,深一层地揭示了炀帝这个淫侈昏顽之君肆意纵欲、死不悔悟的本性。尽管他生前并未乘舟游至天涯,死后重逢陈后主更属虚幻,但根据他已经充分暴露的无穷享乐欲和生前已打通八百里江南运河,准备南游会稽的事实,上述推想便完全符合人物的思想性格与行为逻辑。何焯说此诗“前半展拓得开,后半发挥得足,真大手笔”(《义门读书记·李商隐诗集卷上》),实际上已触及它运用典型化手段进行“展拓”、“发挥”的问

题。这颇有些类似小说创作根据人物性格逻辑来写人物行动,从已然推想未然,事属虚拟,情出必然,是更高的艺术真实。

二是将两件本不相接之事,略去时间距离,将其紧相组接,以突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北齐二首》之一:“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冯小怜的进御与北周攻占北齐军事重镇晋阳,时间上本有相当长距离,这里将它们说成同夕发生之事,虽与史实有出入,却更有力地表达了“一笑相倾国便亡”的主旨。如解为进御之夕已预告亡兆,反失诗味与诗人用心。这很像电影中的剪接。现象间的因果联系借此集中体现,获得明快警动的效果。

三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来表达深刻的政治主题。《齐宫词》通过九子铃这一微物,不但讽慨南齐后主荒淫昏愤,自取灭亡,而且串连齐梁两代统治者荒淫相继的情景,深寓无视前代亡国教训,必将重蹈覆辙的意旨,诚如屈复所评:“荒淫亡国,安能一一写尽,只就微物点出,令人思而得之。”(见《玉谿生诗意》)小中见大,故微物不微,成为齐亡之见证,梁亡之预兆和亡国败君相继的象征。《隋宫》七绝不去铺写炀帝南游江都的巨大靡费,仅就制作锦帆一事作突出描写,“得水陆绎骚、民不堪命之状如在目前”(《义门读书记·李商隐诗集卷上》)。这种举一端以概其余的写法也是一种典型化的手段。

四是在史实或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创造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如《龙池》根据玄宗、杨妃、寿王间的乱伦关系构想出龙池宴罢归寝,“薛王沉醉寿王醒”的情景;《瑶池》根据《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宴穆王于瑶池及临别相约重见的情节,构想出西王母在瑶池等候穆王重来而徒闻哀歌动地的情景,都颇具小说中虚构之场景的意味。

五是深入开掘历史现象的某一本质方面,熔铸多方面的生活内容,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楚灵王好细腰,而宫中多